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美〕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著

佚名译 黄兴涛 校注

中国人的气质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支那人之氣質

作新社藏版

中华书局

西方的中国形象

黄兴涛 杨念群 主编

中国人的气质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美〕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著

佚名译 黄兴涛 校注

支那人之氣質

作新社藏版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气质/(美)明恩溥(Arthur H. Smith)著.-北京:中华书局,2006

(西方的中国形象/黄兴涛,杨念群主编)

ISBN 7-101-05149-9

I.中… II.明… III.民族心理-研究-中国 IV.C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381 号

书 名	中国人的气质
书名原文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著 者	[美]明恩溥(Arthur H. Smith)
校 注 者	黄兴涛
丛 书 名	西方的中国形象
主 编	黄兴涛 杨念群
责任编辑	马 燕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42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149-9/K·2273
定 价	22.00 元

支那人之氣質

作新社藏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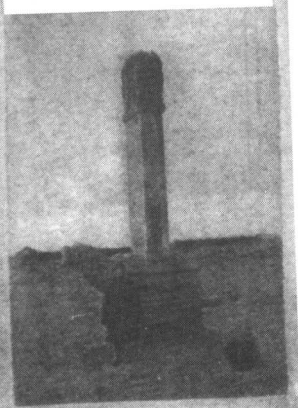


通州燃灯塔，
北京郊区

拱门



天真的儿童



龟趺

“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总序

二十余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旨在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该丛书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读书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还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国民族的自我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于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

的内容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备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探险家、律师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等,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非同时期有机会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版,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

“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可见本丛书所译《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的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期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

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

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感性突显、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这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本译丛最早筹划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1997 年至 1999 年间，它曾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名，由时事出版社和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推出过十种，受到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但此后，终因我们精力不济，未能继续编译下去。多年来，虽屡有朋友鼓动、多家出版社诚恳相邀，我们却始终畏葸不前、未敢轻允。2004 年底，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李晨光、马燕、孙文颖等郑重来函，希望我们能将此套译丛改在中华书局出版，争取每年推出 3—5 种，持续不断地长期编译下去。书局的领导对此也很支持，意在使之成为一项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工程”。经多次商谈、我们终于又在这个文化人“情有独钟”的老牌出版社的召唤之下重鼓余勇、再次投身到此套译丛的编译事业中来。

由于原来所出版的十种书分散在两个出版社，且早已绝版，有的译校也尚欠精审，故此次在推出新译之前，在汉学编辑室上述几位专业编辑的大力协助之下，各译者又对原译重新进行了认真的校审或修订，并首次以十部汇齐的完整形式，将其予以重版。在方便读者的同时，也希望此举能为译

丛今后的发展,奠定一个较为牢靠的基础。

但愿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对于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认知西方人当时的中国观,能够多有助益,并在今后“持之以恒”的坚持中,真正成为编者、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共同喜爱的学术文化事业。

黄兴涛 杨念群

2006年6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及其《中国人的气质》

——一部“他者”之书的传播史与清末
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

黄兴涛

一 从湮没百年的译著 《支那人之气质》迟到的发现说起

2003年8月,当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亲眼见到《支那人之气质》一书——这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名扬四海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百余年前的中文译本时,尽管是顺着美国学者海弗和旅美学者刘禾所提供的线索有备而去^①,却依然为它

① 我曾从巴黎特和费正清1985年合编出版的《基督教在中国:来华新教传教士早期著述》一书中所收海弗(Hayford, Charles W.)的论文《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特征:阿瑟·史密斯和他的中国论著》的一个注释里得知,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一部由阿瑟·史密斯(明恩溥)本人亲自赠送的、译自此书日文版的中文译本之“copy”。但不知它究竟是否属于正式公开出版物。刘禾在其英文著作 *Translingual Practice* (《跨语际实践》,1995年初版)中曾提到此书,1999年底她在大陆出版的《语际书写》中,复将此信息直接传给大陆学者:“《支那人之气质》,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出版,是据1896年涩江保的日译本用文言译出,

那毛笔题写的醒目书名,为它那公开出版的全译本的正规形式,以及书前译者“不可不译之说三”和“不可不知之说四”的慷慨激昂的“弁言”所触动。它的存在本身,等于宣告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有竞相登场的该书中文译本都只能算作“重译”的性质;等于说明了包括鲁迅、潘光旦等在内的曾主张翻译此书并致力于倡导民族性或国民性改造的众多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它的存在竟然一无所知;等于掘发出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鼓吹民族性改造的先驱者们的思想又一种不可忽视的可能来源,等等,等等。与此同时,它还勾起了自己对多年以前曾四处寻找此书英文原版、督促匡生雁鹏日夜翻译的一幕幕难忘场景的回忆。

我想,得见此书之后感慨万千,或至少有所感触的,当绝非我一人。下列译著的译者们,恐怕对此都不会无动于衷:

(一)《中国人的性格》,吴湘川、王清淮译,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二)《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2005年由出版社重版时,改名为《中国人德行》;

(三)《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四)《中国人的特性》,匡雁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1996年8月译毕);

并包括日译者的注解。”在注释中,她又写道:“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珍本书库发现这本1903年的翻译,完全是意外。出版商作新社自称是翻译者,但未注明是哪些人。”(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75页,100页)但关于此译本本身,刘禾没有谈到更多内容。

(五)《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六)《中国人的素质》，林欣译，京华出版社 2002 年版；

(七)《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舒扬、舒宁、穆稗译，上海出版社 2004 年版。

上述译著，乃近十余年来内地陆续出版的明恩溥此书之中文新译本。但译者们似乎都不曾得知，至少不曾提到，早在 1903 年，这部风行字内的英文名著就曾有过一个中译本问世。它由作新社出版于上海，名为《支那人之气质》，是由 1896 年涩江保的日译本转译而成。当时译者没有署名，只题署“作新社藏板”。

作新社是 20 世纪初年从日本转译西学的重要译书机构，1902 年由中国留日归国学生戢翼翬和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于上海。其译者多为留日学生，承担编辑和印刷工作的也有一些日本人。作新社成立之初，曾翻译出版不少译著，如加藤弘之著、杨荫杭译的《物竞论》，卢梭著、杨廷栋从日译本重译的《路索民约论》等，这些译著都曾流行一时，影响不小。

让人不无疑惑的是，这部作新社出版的中文本《支那人之气质》，在当时的中国却几乎难见直接称引和批评的文字，以至于竟被后人长期遗忘。以该书原著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和它所讨论的敏感主题而言，的确不无令人费解之处。笔者猜想，以下三个因素或许值得注意：一是该书出版较早，当时即印数不多，故流传极少，见者弥罕；二是该翻译间接来自日本，所译文言受日本文法制约较重，不甚流畅可读；三是当年一般国人在心态上尚难以容忍其观点，惟其敏感，故随看随毁，致其大多无法存留下来。这后一点，从当时译者竟然回避署名，不难窥

见一斑。

1936年,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在给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所写的序言中,曾谈到此一中文转译本的传播情形,颇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后者的理解。他写道:

我初次得读明氏的这部书,约远在二十五年以前。所读的不是英文原本,大约是日文译本,因为记得书名是《支那人之气质》。我也记得在那本书的许多页的空白处,有不少铅笔写的批评,其中大部分是别的读者在读时发生的反感,还恍惚地记得有“胡说”和“放你娘的……”等类的话。我那时是一个很幼稚的初中学生,读了译文,再读了种种怒发冲冠的批语,自然对于明氏的描写也就大不以为然。虽然没有在书中写下什么,但对于书中不少的地方不免要发作几声“岂有此理”!^①

不过,李景汉的记忆较为模糊,表述也很含糊,致使一般人误以为他所说的仍然是日译本本身,而不是中文转译本。实际上,从李景汉先生的上述回忆来看,他初中时候(1911年前后)所读到的那部为许多人做过批语的《支那人之气质》一书,就是1903年由日译本转译过来的此中文译著无疑。由此可见,当时该译本在中国传播虽然不广,却也并非毫无影响。

其实,探寻百年前此一译作被湮没的原因,与追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该书被国人狂译的缘由,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

^① 见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李景汉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版。原序写作于1936年6月。

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的激流中,民族性或国民性改造声浪再度高涨、“鲁迅热”重新飙起和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极度流行于内地的情形。但即便是在那样一种激烈反传统的文化氛围中,《中国人的气质》却也并未能被及时地出版——尽管当时,鲁迅生前曾多次主张翻译此书一事已为不少人所知,同时,“中国民族性或国民性”也再度被学界作为重要学术课题开始专门研讨,而有关的资料摘编中,也常常涉及到明恩溥和其他传教士的片言只语,甚至有的学者还已经翻译完此书^①。但那时的国内环境,似乎还只能容忍自己的同胞解剖“中国国民性”,仍很不习惯于冷静地正视外国人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国民性”进行臧否。1990 年,当笔者与国内几家著名出版社商谈出版“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译丛一事时(所列目录中包括《中国人的气质》一书),结果均被拒绝,理由是:现在出版这些东西,尚不合时宜。作为参考资料摘编可以,单册独立出版不行。

不过进入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 90 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 1991 年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的性格》还几乎鲜为人知,那么 1995 年以后陆续出版的该书译本,则逐渐畅销起来。这些译本水平参差不齐,彼此的关系也有待研究,但它们却多能屡次重印,且走销势头至今不衰。究其原因,这应该与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扩大的、持续既久的开放程度和商业化水准密切相关。随着中西进一步交往的需要,人们不仅对了解近代以来西方的中国观越来越感兴趣,

^① 1980 年,张梦阳在《鲁迅研究年刊》(2)中发表《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文,对明恩溥书中的不少观点加以认同。另据其附载于 1995 年译著后面的《译后评析》一文透露,1988 年他们已译完此书,但未能出版。

也逐渐具备了承受外人批评的民族自信心,而学术的积累与市场多元化的运作,则又使得以往各种人为的藩篱得以渐被拆除。

近年来,后现代思潮波及学界,旅美学者刘禾受萨义德的《东方学》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等的影响,剖析所谓“国民性神话”现象,引发了有关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新一轮讨论,而鲁迅与明恩溥的观点及其彼此间的关系,遂再度成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新近备受学界重视的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之所以能够赢得人们的青睐,归根结底还在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内涵——它当年的风行程度实在远甚于今。而要阐释与揭示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我们则需首先回到该书作者及其著述的时代。

二 明恩溥及其关于 中国著述之总体特点

明恩溥(1845—1932),本名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郎城(Vernon)。他曾教过小学,在贝洛依特学院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遵从家庭传统,进入安德乌(Andover)神学院深造。其间已对有关中国的传教问题发生兴趣。1872年夏天,他终于携新婚不久的妻子到达中国上海,再由上海到山东,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50年的传教和写作生涯。

明恩溥活跃的时代,正是西方列强以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逼迫中国与之通商、接受传教和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成定势的时代。他本人属于美国在华最有影响力的教会——公理会